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书 信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孔 欢 曹 歌
封面设计:尹凤阁 王师韵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6036-8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9213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九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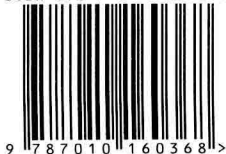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2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34.375 插页:4
字数:944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6036-8 定价:7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ISBN 978-7-01-016036-8



9 787010 160368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三卷,收入 1852 年 1 月至 1855 年 12 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他们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 291 封;附录部分收入燕妮·马克思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燕妮·马克思受马克思委托给其他人的书信,共计 19 封,还收入阿·克路斯给约·魏德迈的 5 封书信的片断,其中转述了马克思给克路斯的 5 封现已遗失的书信的部分内容。

这一时期,席卷欧洲大陆的 1848—1849 年革命已经平息,反动势力的统治得到巩固,欧洲进入政治上的反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呈现出普遍繁荣的景象,但经济危机的症候已明显可见。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争夺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各国统治阶级继续对进步力量进行残酷迫害,革命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深入总结革命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他们密切关注工人运动的发展变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各国无产阶级保持密切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各种错误的行动和思潮,帮助无产阶级进一步明确在政治反动时期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鉴于当时欧洲各国实行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共产主义者无论是出版书籍还是创办报刊都十分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借助资产阶级进步报刊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

深刻分析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积极为资产阶级进步报刊撰写文章，评述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各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他们还潜心于理论研究，广泛涉猎各种文献，并作了大量摘录和笔记，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并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继续对以往的革命、特别是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积极制订新的合理的斗争策略。

在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政变后不久，马克思着手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评述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 1848—1849 年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从 1852 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给约·魏德迈的多封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密切关注波拿巴政变的进程和结果，并就这个问题深入交流看法。这些书信反映了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其中还对一些重要观点作了明确的阐述。马克思 1852 年 3 月 5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他在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 79 页）

从 1851 年夏天起，恩格斯陆续写作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的系列文章,分析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阐述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11 卷)。马克思经常关心恩格斯写作的进展,并对恩格斯的 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这一时期的书信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导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担任同盟伦敦区部的领导工作。1851 年 3 月在科隆的中央委员会的很多成员被捕之后,伦敦区部实际上成为同盟的总的领导机关。1852 年 3 月,伦敦确定为美国的总区部,此后不久纽约等地建立了同盟支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结束后,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星期三这里的同盟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见本卷第 308 页)同盟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居住在英国、美国、德国等地的很多盟员都保持着联系,指导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帮助他们出版刊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852 年 10—11 月德国科隆陪审法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进行了审判。从本卷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千方百计营救被捕的同志,他们冲破重重阻力,把有利于被告的证明材料寄往德国,用作法庭证词。他们还联合其他革命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声明,说明事实的真相,揭露普鲁士当局捏造事实、作伪证、发假誓等卑劣手段,声援被审判者。审判结束后,他们又积极争取募捐帮助被监禁的人及其家属。马克思在 1852 年 12 月 7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说:“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工作,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见本卷第 321 页)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党的确定的任务,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完成这项任务。”(见本卷第 322

页)马克思当时还写了题为《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的小册子。由于普鲁士当局的严厉查封,这本小册子从出版到发行的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了解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和出版过程。马克思在1852年10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对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见本卷第275页)他在1853年3月25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指出,出版这本小册子“在目前能给我们可爱的普鲁士人以最沉重的打击。”(见本卷第373页)

当时在德、意、法、俄等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有很多人顾顾客观现实条件,企图密谋暴动,冒险主义盛行一时。这些人所宣扬的思想、纲领以及所谓社会拯救方案与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本卷有大量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以阿·卢格、弗·金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等人的斗争过程。1851—1852年,金克尔、维利希等人联合起来,声称要在德国策划暴动,在欧美革命者中间推销所谓“革命公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这种政治上荒谬的冒险举动,并对他们的宗派主义、利己主义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从自己安全的隐蔽所里干有利于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的勾当。”(见本卷第20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以讽刺性的笔调刻画了这些人物的群像,帮助人们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和匈牙利革命者科苏特

的密谋策略以及他们对波拿巴寄予的幻想。

尽管在当时欧洲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进步和成长,对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恩格斯在 1853 年 4 月 12 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经过革命的洗礼,德国的无产阶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具备了以前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这次登上历史舞台也将比上次体面得多。”(见本卷第 385 页)

撰写政论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活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许多报刊成为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向工人群众提供思想武器,揭露统治阶级镇压革命者的阴谋,反击针对革命者的诽谤诬陷,与流亡者中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重要阵地。从本卷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为美国共产主义杂志《革命》,美国进步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及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等撰稿。

《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流亡美国后于 1852 年创办的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份当时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创办的、世界仅有的共产主义杂志十分看重,认为支持《革命》“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见本卷第 51 页)。他们不取报酬,积极撰稿。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最初就是为《革命》所写的。马克思还积极动员自己周围的共产主义者如约·格·埃卡留斯、威·皮佩尔、恩·德朗克等向魏德迈供稿。燕妮·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我的丈夫为您几乎向所有可以利用的共产主义笔杆子征了稿(他还向德国征过稿)”。(见本卷第 4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51 年开始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从 1855 年起通过拉萨尔与德国的《新奥得报》建立了联系。恩格斯在谈到撰写报刊文章的意义时说道：“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见本卷第 366 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寄给《论坛报》和《新奥得报》的文章虽然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的，其实有很多都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两人在撰写报刊文章方面常常互相支持、通力合作。他们经常共同确定论题，相互提供研究资料，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也经常在文章中采用对方的观点。一开始时，马克思只能用德文为《论坛报》写文章，常常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后再寄往纽约。遇有恩格斯所擅长的军事评论等题目，或者马克思因为生病，因为忙于别的事务而无法脱身，通常都是由恩格斯直接给《论坛报》和《新奥得报》供稿。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他们对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十分关注，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特别是各种重大事件进行评述，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阐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书信中有些内容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所做的准备，或者是对有关论述的补充和发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1852 年至 1855 年，英国经历了一系列内阁更替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追踪，对新的内阁上台后实行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英国内阁的更替是英国政党分化与重组的结果，是土地贵族、金融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产物。英国统治阶级宣称要进行议会改革和选举制度改革，一方面

这种改革势在必行，因为英国统治阶级要是“不大大扩大选民的范围就再不能治理英国了”（见本卷第 382 页）；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这种改革是虚伪的，因为选举财产资格并没有取消，真正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是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广大工人群众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分析表明，英国实行的只不过是议会形式为装饰的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英国工人阶级的活动，他们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英国现代历史上，“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成就”，都是统治阶级“对工人所作的一种让步”（见本卷第 5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英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关注宪章派争取劳动者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活动，并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1855 年 6 月 17 日宪章派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反对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议会法案的示威“完全是革命的”（见本卷第 66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派左翼领导人厄·琼斯的革命活动，支持他反对宪章派右翼向资产阶级妥协的斗争，经常向他提出明确而又中肯的建议，同时也对他的一些脱离实际、追求表面形式、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发动各种运动的做法提出批评。对于琼斯出版的《寄语人民》以及他创办的周报《人民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专门为之撰稿，还承担了部分编辑工作，甚至帮助解决财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支持对琼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 1852 年 3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述：“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见本卷第 83 页）

路易·波拿巴于 1851 年底在法国发动政变，一年后改共和制为帝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

采取的种种措施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波拿巴的经济措施导致商业动荡,投机盛行,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对波拿巴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法国统治阶级内部反对波拿巴的利益集团正在加紧密谋推翻他的统治,波拿巴政权岌岌可危。马克思指出,一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却推动一切”(见本卷第 47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手法的欺骗性。波拿巴在法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面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外又以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的姿态出现。恩格斯在谈到波拿巴的邮政改革、国债利息变更条款以及自由贸易等所谓的社会主义措施时指出,这一切不过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措施,波拿巴“终究将为形势所迫而把自己全部的社会主义狂想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见本卷第 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重视法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对法国无产阶级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853 年 3 月 13 日在法国革命者弗·拉斯拜尔的夫人的葬礼上爆发了反波拿巴的群众游行。马克思欣喜地告诉克路斯:“2 万名穿着礼服的无产者的突然出现,对波拿巴分子有如晴天霹雳。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见本卷第 374 页)

1853 年克里木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关注战争形势,深入研究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揭露他们在战争中追求的自私目的,以及他们遏制战争蔓延、阻碍人民运动发展的图谋。他们这一时期的书信包含着大量评述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各国在战争进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克里木战争是由于土耳其衰落,英、法、俄等大国为争夺对该地区的霸权而发生利益冲突的结果。马克思在 1853 年 3 月 10 日的信中评述冲突原因

时,请恩格斯注意“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见本卷第 35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作为同盟国的英法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英国企图通过战争重获海上霸权,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同时让法、俄、奥等欧洲列强之间保持均势,而法国则想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在激烈冲突的同时,又时刻面临一个共同的任务:防止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冲突将超出各国统治集团利益冲突的范围,最终导致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恩格斯写道:“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 526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反对沙皇制度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欧洲革命战争最终将引起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将消灭欧洲的反动制度,并解决由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而没有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反映了他们潜心于理论研究的情况。他们的理论研究是同革命实践和政论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激励他们不断进行理论探索,而撰写政论文章和对现实的关注也促使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根源和动因进行理论思考。

马克思在这几年里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英国博物馆阅读各个流派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还浏览了很多报刊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这些笔记和摘录成为他日后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早就计划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恩格斯认为出版这一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你应当把你的《经济学》写完,以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们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可以作解释……

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所有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见本卷第366页)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计划在这一时期没有实现。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大量实际材料为基础,探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变化和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的问题。他们在许多书信中根据对欧美国家工商业状况的深入分析反复指出,当时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严重危机的征兆。同时,他们也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得到扩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以及英国在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地的殖民活动,对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的压力有一定的缓减作用,但这又意味着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波及的范围将更加宽广。恩格斯在书信中还谈到,至于危机是否马上导致革命,“这主要取决于危机的强度”(见本卷第204页)。

马克思在一些书信中批驳了美国庸俗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对他的地租理论的攻击。凯里错误地把地租理论说成是李嘉图全部理论的基础,他还把地租说成是利润的一种形式,而把利润说成是工资的一种形式,企图由此否认地租(地产)和利润(资本)与工资(雇佣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批判了凯里的观点,他指出,凯里否认阶级对立的存在,其现实根源在于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很不成熟,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识到李嘉图理论的根本缺陷,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地租问题上的矛盾,只有超出这种经济学的框架才能得到解决。“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仁爱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见本卷第47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表明,他们在这一时期还深入研究了大

量的历史文献，内容涉及古罗马史、亚洲国家的历史、西班牙革命史以及西方国家外交史等。他们经常在书信中向对方介绍自己近期在这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就研究结果交换意见，阐述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古罗马史，他写道，“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 655 页)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梯叶里 1853 年出版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很感兴趣，作了详细的摘录，并在 1854 年 7 月 2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他肯定了梯叶里以详细的材料为基础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作的描述，认为“任何著作都没有对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做过这样的描述”(见本卷第 591 页)。但是马克思批判地指出，梯叶里的阐述忽视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特点，而且梯叶里根本不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写道：“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见本卷第 590 页)

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的利益冲突的尖锐化，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851 年就开始对土耳其、波斯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进行研究。他们的书信表明，他们研究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斗争、商业往来、战争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揭示了这些地区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对这种特殊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与西